

哲人其萎 风范犹存



缅怀恩师楼栖教授

校庆60周年巡礼·教授篇

文杨益群 作图杨恒利

榜抗日，与蒋介石存在着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欢迎、保护进步文化人。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积极做好桂系的统战工作。...

正是桂林文化城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吸引了报国心切的楼栖教授。1939年，他在香港求学，虽然生活远比陷于水深火热的祖国安逸，但“隔江烽火，召唤我投奔祖国的怀抱。于是，编排了满身的粉笔屑，泰一《岛上谣》，做一个梦，奔向遥远。...

《广西日报》创刊于1937年4月1日，系桂系所办，该报聚集不少进步文化名人，如总主笔金仲华，主笔刘思慕，采访部主任刘火子、陈子涛(1947年遭蒋介石杀害)，副刊部主任艾青。...

楼栖教授著作甚丰，但其自认为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创作，足见其对诗情有独钟。他是中国诗社重要成员。先后在桂林创作发表了《斯巴达之魂》、《七月的烽火》、《枕木·列车》、《别山城》、《春之献》、《定型》、《算盘》、《悼儿殇》、《南方的城市》、《岛国的世纪梦》等诗作。...

七月的烽火/四年前在卢沟桥/燃起了烈焰/五千年的历史闪烁着红光/四百余兆的炎黄子孙/昂头作擂天的呼啸/东方的不愿作奴隶的/民族，挣脱了镣铐/广阔的原野卷起血腥风/掠过万里长城/掠过黄浦江畔/掠过重山又重山/也掠过了黄河的滚滚怒涛/长江的滔滔白浪/百余年来血债/要向敌人清偿

长诗《南方的城市》和《岛国的世纪梦》，每诗均在四百行左右，前者系“广州沦陷二周年于桂林”所写，后诗则于1941年除夕，也即香港沦陷之际写于桂林。诗人以饱蘸情感的笔触，讴歌这两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南方的城市”广州和“海上明珠”香港的光辉历史及其斗争精神，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鼓舞国人团结奋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楼栖还撰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其代表作有散文、小说集《窗》，1942年由桂林山城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入作者在香港、桂林等地创作的作品13篇。有散文《窗》、《岛上谣》、《山居恋》、《黄花忆》、《冬》、《风尘草》、《田东行》、《周年祭》、《旧寓》、《阳朔冬旅》、《叔父》和小说《曹末》、《伴侣》等，作品多数写于桂林。...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在此有必要对当年桂林文化城作简单介绍。抗战期间，随着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桂林遂成为联结我国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又因桂系标

行》。这些文章的这样写法，一半也是迁就编辑底脾胃，才给自己底感情以这么大的挤压。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爱纯朴、爱血肉的生活，爱火热的战斗，像《窗》、《曹末》和《周年祭》，我变得没有这么华丽，也没有那么拘谨了。”文集《窗》出版后，广受好评，反应热烈。桂林唯一的文艺评论刊物《文学批评》创刊特大号上，特发文高度评价，指出：这些反映抗战生活及其感受的作品，“笔触颇为广泛的：有牢狱的诅咒，有自由的呼吸，有岛国靛靛的写生，有祖国抗战的歌唱，有后方人物的素描，有战士英勇的姿态。个人的悲欢连结着时代的喘息，文笔生动多姿，永不会给读者以单调感！”(载《文学批评》创刊号1942年9月1日)其中，写于香港的《曹末》(《岛上谣》)和作于桂林的《伴侣》(《风尘草》)《田东行》(《周年祭》)《阳朔冬旅》等篇，被作者收入《楼栖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2月17日写于柳州《周年祭》(载桂林《大公报》1941年4月4日副刊第8期)文章不长，作者以白描手法，不加修饰，信笔写来，悲情横溢，从儿子还在娘胎“就擎起小拳头慢慢划开腹壁，作颤动的小捣乱”；到“从来不爱哭”，“天真的笑露象一朵灿烂的蔷薇，记录了全家人的欢乐”；再到“仅仅是两岁的稚龄，你却却有惊人的‘狡计’”，“奇特的智慧超过同龄的婴儿”，写尽了儿子的娇憨聪慧，宝贝至爱。随后笔头陡然一转，又抒写了娇儿生逢乱世，乱世遭飘荡的悲命：卢沟桥一声炮响，国难当头，“我还不高兴你来时，你却悄悄地来了”。因无法抚养，头一年(即1937年，笔者)，只好“寄养在九江外婆家”。翌年冬，广州沦陷后一个月，“外婆抱着你饱尝了逃难的苦味，取道石岐来到香港”。前年(即1939年，笔者)，我回祖国时，携你奔逐了几千里的长途，旅途劳累加之昆明不适的高原气候，爱子终于不幸夭折。望着这山城荒郊的孤坟，作者写下了“黄土的分量于你太沉重，无泪的悲苦于我却太浓”的诗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情透纸背，痛彻心扉！楼栖教授正是通过对爱子大喜大悲的强烈对比，形象生动地控诉日本强盗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言简意赅，不可多得。

在我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湘桂大撤退——抗战时期中国大人流亡》(漓江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一书时，曾搜集到不少当年逃难途中儿童病亡甚或被丢弃的例证，如由田汉率下的新中国剧社，从桂林撤往贵阳途中，其优秀作曲家费克、曹琨夫妇过安顺时，一双儿女突染斑疹伤寒，相继夭折。经济学家蒋学模八个月大的女儿虽患普通的疳积病，也不能幸免于难，夭折于逃亡路上，只好用小石头垫了个小坟莹，忍痛继续逃难。但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都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楼栖教授此文，悲



楼栖教授夫妇(居中)，本文作者(右一)合影

疑填补了空白，弥足珍贵。

楼栖教授还撰写了不少杂文、评论，如1942年1月写于桂林的《应考》和1945年6月写于广西八步的《补考》，针砭时弊，文笔精悍犀利，自成一格，也被作者选入《楼栖自选集》中。时评《莫斯科争夺战与近卫内阁的坍塌》(载《广西妇女》1941年17、18期合刊)一文，作者针对时下流行的对法西斯势力咄咄逼人的担忧，通过缜密严谨的分析，科学地回答人们关于“莫斯科能守得住吗”的疑问，明确指出：“以苏联一国的军力来抵抗欧洲大陆各国的联合军”，看似寡不敌众，“但兵力的多寡，不一定是决定胜败的最主要因素，列宁格勒久攻不下，便是一个实例；但莫斯科争夺战的结果，还是留给事实来证明吧。”后来事实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论断的正确性。剧评《看过了〈李秀成〉》，在指出欧阳予倩编导的《忠李李秀成》的成功与不足之后，对布景也提出独到见解。他说：“布景也是出人意外的华丽，色调都很强烈，每幕的后面都似乎有美丽的天幕，撩起观众深幽的意境。最难得的是，虽然彩排，但也布置得很快。不过，第四幕的几度换景，我都认为大可商量。观众到了第五幕，已经感到疲倦了。再来几次换景，不仅是觉得时间的浪费，而且还要当心情绪的低落。”(载《广西日报》1941年10月31日)深得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所乐见赏识。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前夕，中山大学迁往粤北坪石，与桂林文化教育团体交往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楼栖曾到桂林参加过的，有校长许崇清、教授董董、钟敬文、洪深、高仲华、杨荣国、谭丕模、陈廷瑞、鲁默生、邹韬、吴宗慈、朱谦之、黄昌毅、张掖等，还有尔后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冯乃超、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和教授陈寅恪等。

楼栖教授对他在中大读书时的老师十分尊重。其中令其最动容的是洪深教授。抗战爆发后，洪深离开中大，后赴武汉参加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该部厅长的第三厅第六处，主管戏剧音乐，全力以赴地投身党领导下的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下，进步文人的处境变得险恶起来。

当时在重庆的洪深加之备受困绕，顿感“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见陈美英：《洪深艺术创作年谱》)便举家自杀，以死抗议黑暗与暴虐。幸亏被郭沫若发现，才得以抢救脱险。此举引起全国文艺界的极大轰动，纷纷慰问。远在桂林的楼栖惊悉之余，即撰写了《记洪深》(载《广西日报》1941年3月7日)，亲切地回忆起五年前洪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时的音容笑貌，学生们的好评敬慕，最后指出：

“当年如此悠闲的教授，对人生饱经忧患的剧作家，谁又想到他竟会感到生平用血汗，用脑汁写的剧本还不够，自己在舞台上表演悲剧还不够，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肉在人生舞台上表演最后最悲壮的一幕呢？倘若说一个人的自杀是最后痛苦的解脱，则这样的“解脱”反而是最痛苦的悲剧。一个人的剧作家，何必将自己的人生如此悲剧化了留自己以毕生的遗憾呢？永远远健康下去吧，没有叫自己为痛苦而牺牲的理由。”表现了楼栖对师长敬惜之深情厚谊。

洪深在住院期间，谢绝了国民党政治部长张治中和朋友所赠的医药费，体现了其狷介生性。而此时，中大即来电慰问并聘其为该校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元，还汇款一千五百元。使之深受感动，决定三月前住履新。洪深康复上任后，更为奋发工作，热心抗战宣传活动。他是桂林最受欢迎的老朋友，早在1937年4月7日曾率领中山大学文化考察团一行十人抵桂，受李宗仁、白崇禧高规格设宴招待，徐悲鸿应邀作陪，第五路军总政治训处国防艺术社特献演《回春之曲》并请他讲演、辅导。

复出后，桂林文艺界对他更为欢迎重视，经常邀请他讲座、辅导。田汉、杜宣还与其约好，每年寒暑假或困暇，请其来桂导演至少两出话剧，从而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除夕，在田汉和欧阳予倩的支持下，桂林文艺界还特地举行洪深五十寿辰祝寿会，还由与会者即兴联句成祝寿诗，诗中还嵌入了一些洪深的剧作名称，别开生面，并由柳亚子即席挥毫写就寄给洪深，为抗战文坛之美谈。

此时，楼栖教授的太太郭茜菲也在桂林《力报》社任职。报社同样集结不少进步文化名人，如总编辑冯英子，主笔邵荃麟、杨承芳、储安平，副刊《新垦地》、《半月文艺》先后由聂绀弩、葛黎、彭燕郊、王西彦等人主编，编辑记者主要有胡希明、高旅、邵慎之、郭茜菲等。师母工作认真负责，敢于直面黑暗势力，抨击时弊，深得好评。当年该报采访部负责人胡希明回忆说：“郭茜菲到《力报》当记者时，刚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不久。她瘦瘦小小的个子，跑采访很勤快。一个女同志在当时那么复杂的环境下搞外勤工作，

桂林地处桂北，虽说是阳春三月，但气温仍较低，尤其遇上绵绵阴雨，更是春寒料峭，容易感冒。楼栖老师到桂适逢此天气，致伤风感冒，清涕直流，但他仍耐心回答我的提问，且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写完此打油诗之后，他竟边朗读边解释，憨态可居，幽默风趣。我终于看到了恩师有别当年课堂上严肃认真的另一面。

自此之后，我与恩师楼栖教授的接触日趋紧密。翌年，我调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离开前适逢广西社科院评审职称，鉴于我的高调函被院领导压下两年多不走，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放行。我不能再等职称最后确认再走，则日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只好由院职称办将我申报副高级职称有关材料(包括本人学术成果、两位专家鉴定书和院评审委员会投票通过的结果证明)，随后转到新单位重新评审确认。广东省社科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规定从外省转来的专家鉴定需再由广东省内一位专家评审确认。我刚回广东，人生地不熟，而楼栖教授对我进行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比较熟悉，由其鉴定确认最为对口合适，于是只好又求助于他。先生不不厌其烦，以扶掖后进之精神，于1987年10月9日为我申报副研究员职称作了鉴定。

不久，我的副高级职称获通过，我当即去信向恩师报喜并致谢。楼栖老师也立即复信。1988年3月29日来信如下：

益群同志：

信和附件已收到，你为了写书患病，现已康复，今后诸希珍重，要劳逸结合，我国中年知识分子，健康大都不好，值得注意。你提升副研究员，已获通过，有这么多学科著作，不会出问题的。(桂林文化城概况)中《广西日报》部分，我记得黎蒙接任社长后，主笔是金仲华，其妹金瑞芬任记者，编辑还有洪道，我和马国亮，胡明树没有编过副刊，副刊编辑是艾青、陈芦荻、韩北屏，当时姚苏风还有一上海人，姓名我忘了。后来《广西日报》(昭平版)副刊编辑我记得是陈闲。记忆有误，仅供参考。

茜菲于去年十月间乘公共汽车回避自行车急刹，把她从后座弹起来，摔落在地板上，后脑受伤，加上脑动脉硬化，颈椎骨增生，经常头晕，有时不能起床，历时五个月，最近大有好转，可以起来走动，头也不那么晕了。勿复不尽，顺祝

春祺

又：代抄旧作，谢！

楼栖 三月二十九日

之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我从中获益良多。楼栖教授在我眼里，已由一般的师生关系，进而上升为良师益友。1995年6月，楼栖老师寄赠新出版的《楼栖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并附上字条写道：“此书曾寄去通心岭12栋105室，被退回，‘查无此人’，‘再寄’”(按：因搬新址)。新书刚出版即一再寄我，不厌其烦，足见先生对弟子之厚爱！1996年4月2日楼栖老师又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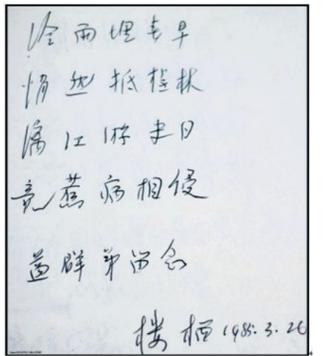
益群同志：

读来信异常高兴的。多年来你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收获丰硕，令人敬佩。大著作已出版，望能寄我一册，以便拜读。来信提到十多年前在桂林时的录音带，早已淡忘，无从回忆。你准备整理出来，结合当年拙作，写成文章，盛情可感，顺致谢忱。去年十月，你因公来穗，夜访旧寓，我深为不安。我搬家多年，疏于访问，使你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深以为歉！我家新址：中大蒲园621-102。我家电话：中大总机转1216。我今年84岁，去年12月病了一场，住院20余天。风烛残年，前途路短，这是自然规律。勿复不尽，顺颂

春祺

楼栖 4月2日

接恩师情真意切的来信自然高兴，但其病弱之躯和字里行间所流露出对人生苦短的嗟叹，却着实令我有些郁闷。殊不知这竟是恩师留给我的绝笔信！尊敬的楼栖教授于1997年5月11日急病入院，因抢救无效，于5月23日早8时在广州不幸仙逝，享年85岁。噩耗传来，清



然泪下，不胜悲痛！因忙无法前往悼念，遂发唁电哀悼与慰问。6月9日，收到其家属，夫人郭茜菲，儿子启芬、启光、启明，女儿纪平联名的《答谢信》。

悲哉！恩师驾鹤西去已多年，眷念之情未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值元宵佳节，敬请恩师在天之灵，接受弟子虔诚拜谢！叩谢恩师教导、提携之恩，没有您的教导指引，我不可能毕生坚持文学研究；没有您的关照，便没有我如今菲薄成就！

写于2013年5月22日恩师忌日前夕，改于2014年元宵节。

益群弟留念 楼栖 1985.3.26.